

回首  
回首來時路

來時路

全漢昇（中央研究院院士）

民國廿四年（1935）我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因恩師陳受頤先生的推薦，得以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此，與史語所結下終身不解之緣。

由於大學三、四年級時，我曾多次投稿於另一恩師陶希聖先生所主編和發行的《食貨半月刊》上，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有關行會的文章。所以進入史語所後，傅斯年先生即囑咐我專門研究中國經濟史，期盼我能拓墾這尚未有人耕耘的園地。當時，所內人數並不多，除傅先生外，幾乎是一人治一朝代史的情況，例如：考古和上古史方面有董作賓、李濟、高去尋、陳槃等諸位先進，勞榦先生專治秦漢史，李光濤先生潛心於明史研究，我從宋代的商業著手。或許是因為每個人所關心的時代和專題不一樣，人數又寥寥無幾，在傳統的研究風氣之下，我們只閉門讀書，專心找資料，彼此之間很少有公開機會討論。

七七事變後，我跟著史語所輾轉於湖南長沙、雲南昆明和四川李莊，仍然繼續探索宋代經濟，並逐漸上溯至唐代，得到摯友嚴耕望先生的不少啓示。除了探討北宋首都汴梁（開封）的商業發展外，並注意到揚州和廣州在國內外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我認為交通運輸的便利是促進此不同性質的三個城市（基本上，汴梁屬於行政功能色彩濃厚的城市，揚州是國內商業重鎮，而廣州是國際貿易商埠）得以繁榮的一重要因素。我進一步思索連結唐宋時期經濟重心的南方和軍事政治重心的北方的大運

河之重要性，完成了《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根據史實分析運河的暢通與否和唐宋國運盛衰的關係。

另一方面，或許是由于戰時通貨膨脹的現狀，使我注意到貨幣和物價變動問題，不料，三十歲出頭的經驗與體會卻成為我畢生心血所灌注的課題。在〈中古自然經濟〉一文中，我受到德國歷史學派權威B. Hildebrand啟發，試圖從貨幣制度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內涵。我發現到從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直到唐代中葉，實物貨幣取代金屬貨幣成為人們交易、租稅、地租和工資支付的主要手段，而此與人類歷史發展——從自然經濟演變到貨幣經濟——相悖現象之所以出現的主因是錢幣的供給量與需求量俱減。在供給方面，當時銅產大減和佛寺廣鑄銅像，使主要幣材（銅）的供給缺乏；其次，漢末到隋初，戰爭的結果導致人口銳減、土地荒蕪、交通中斷和商業衰落，自然降低了對錢幣的需求。此後，經過貞觀和開元之治的太平盛世，商業得以發展，幣材亦增，所以金屬貨幣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因此能把往昔以徵收實物為主的租庸制度改為徵收錢幣為主的兩稅法。

對貨幣制度的興趣驅使  
我把研究的時間向後延伸  
到清代，探討自金屬貨幣  
演變到信用貨幣的過程，  
以及從信用貨幣再回歸到  
金屬貨幣的因素。發現到  
在南宋和元代，

年輕時代的全漢昇先生



紙幣的發行與流通，大致都經過價值穩定、溫和通貨膨脹，和惡性通貨膨脹三個階段；而紙幣之所以不穩定的重要因素都是戰爭，由於軍事支出龐大，稅收不足，只好以通貨膨脹政策來彌補財政赤字，此歷史事實幾乎與烽火下的大後方經濟實況相似，也隱約可以看出政治演變過程中，人們感到最切身的經濟生活的一面。

在物質匱乏的那些日子裏，史語所同仁仍孜孜於「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生活。初出茅廬的我也深信只要有史料，就能夠寫出好論文的哲理，因此如何擴大史料蒐集的範圍成為我努力的目標。民國三十三年（1944），終於碰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由於傅先生和社會所陶孟和先生的提拔，我得以和丁聲樹先生一起到美國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同時，社會所梁方仲先生則由美國到英國。

在美國東岸，我不時見到恩師胡適先生，也與楊聯陞先生重逢，我與他是《食貨半月刊》時代以來的朋友。我當初可以說幾乎是為了生活才與此期刊結緣的。由於家境清寒，我的學業有中輟之虞。幸虧恩師陶希聖先生鼓勵我投稿《食貨半月刊》，且出版了習作《中國行會史》，靠著筆耕，我大學三、四年級的生活費始有著落。此恩此德，我永誌難忘，現今憶及，亦淚濶濶而視茫茫。

當時，我除了爬梳史料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外，並經常逛書店，閱讀西洋經濟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書是J. U. Nef 的*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書中詳細分析英國煤礦業的興起與當地交通運輸、資本、技術等因素的關係，亦論及煤礦業及其相連結的鋼鐵業在英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我受到此書的啟發，又覺得日本於明治維新以後，短短七十年的經濟發展，即能稱霸東方，威脅強雄的美英兩先進國，究其因素，工業化乃是日本踏上侵略亞洲之途的動力。並且我在太平洋戰爭末期，能遠離貧困的家園，親身體驗美國富庶的物質文明，不免感慨萬分；所以閱讀此書後，我開始推敲近代中國工業化遲緩的問題。

戰爭結束後，民國三十六年（1947）我回到南京的史語所工作，一面在中央大學經濟系兼課，除講授中國經濟史外，並代梁方仲先生的西洋經濟史課程。時局不安，政府財政困窘，金圓券價值不穩，我以〈唐宋政府歲入與貨幣經濟的關係〉一文，為自己的中古史研究劃下中止符。

一年多以後，我和家小毅然決然地追隨傅先生，從上海坐招商局海黔號到臺灣（在這大動亂的時代中，知識份子幾乎陷於去留兩難的抉擇中，例如丁聲樹先生的書籍已先運到臺灣，但因夫人的反對而未渡海）。我接受傅先生的囑咐，到臺灣大學經濟系講授中國經濟史，為培育這方面的人材而盡力。在研究方面，我從漢陽鐵廠著手鑽研醞釀於腦中已有五年之久的近代中國工業化問題。我受J. U. Nef 的啟發，注意到漢陽鐵廠的成功與否和煤礦資源的地理位置

之相關性、鐵路運輸的重要性，以及資本對報酬遞減的礦業的影響力。由於漢陽鐵廠所產鐵砂從一九〇四年即開始根據合約，出售給日本八幡製鐵所，所以日本很早就垂涎中國的煤鐵礦，終於利用大量貸款給中國而控制漢冶萍公司。其實，除了該公司外，日本所投資的煤礦（例如撫順煤礦、山東魯大煤礦公司等）產量約佔中國煤產總量的六成，日本資本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因為當時不易蒐集到日文資料，我只能利用臺灣所藏資料，所以對此領域的研究大致在民國五十年（1961）左右即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我注意到當時臺灣工業化的程度較大陸進步甚多，這種現象與二十世紀前半臺灣環境較中國安定，並未飽受戰亂的摧殘（此為漢冶萍公司凋零的一大因素）息息相關。我接受美援會的委託，與Dr. Arthur Raper、陳紹馨教授等人率領一群臺大經濟系的學生，針對臺灣的城市與工廠，做了詳盡的調查工作，這可以說是一向埋首於故紙古書中的我，生平唯一的田野調查工作。中國的歷史學者經常漫步於前人的書林之中，卻鮮少擷取現狀；日本學者在戰爭期間屢屢到中國調查實況，或許有其政治性動機，但似乎形成一種學術傳統。直到今日，我所交往的一些戰後才受教育的研究亞洲史的日本學者，仍然承襲此習慣，根據他們的興趣，到中國、韓國和東南亞等地待上一年半載，實際體驗當地的生活和文化習俗。如今，戰爭期間的日本人所完成的調查報

告，就如同十九世紀的S. Ball、R. Fortune等人的書籍一般，成為我們研究相關課題的重要資料。我也希望在民國四十三年（1954）根據當時田野工作而以中英兩種語文出版的《臺灣城市與工業》，能有助於學界對日據後期和戰後初期的臺灣經濟的了解。

同時，我亦未對貨幣和物價史忘情。《臺灣城市與工業》一書問世後，我有機會重遊哈佛大學，閱讀近代西方殖民史的書籍，與費正清教授論學，尋思東西經濟交流與互動的証據，我發現到西班牙經營下的美洲白銀影響到明末以後的中國財政與經濟生活。民國四十四年（1955）我接受胡適先生的建議，經過歐洲回國後，由於王業鍵先生在史語所的協助，我乃能進一步利用史語所庋藏的各種資料，探究清代物價，了解到十八世紀的物價有長期上昇的趨勢，這種上昇趨勢和當時美洲白銀的大量進口有莫大的關係，而美洲白銀之所以大量進口是為了交換中國絲貨。不僅如此，當時各地區間糧價高低不一，於是價格較低的長江中上游地區的米糧，經長江水路運到價格較高的下游和東南沿海銷售；長江下游生產的棉布和過剩的人口，則流入中上游一帶，造成中國境內的經濟交流和人口移動，結果內地農業資源得以開發，解決東南沿海糧食不足的危機。後來，王先生利用經濟發展和貨幣學的理論，將研究範圍拓展到全中國和整個清代的開發中區域與已開發區域的貿易、人口流動和物價波動等，推翻了Skinner的區域理論，對中國經濟

史的研究貢獻很大，我感到非常地欣慰。

研究工業和物價的這段期間，我曾先後擔任臺灣大學經濟系系主任和中央研究院代總幹事，這是除了史語所的研究專職外，我在臺灣所負責過的行政工作。尤其後者，受命於胡適之先生，我雖自知資質平庸，但也只有硬著頭皮盡力而為。在財源困窘的當時，為新所（如經濟所、近史所、民族所、動物所、植物所、化學所等）的籌備與史語所的設備擴充而煞費心思，幸賴能幹的黃國樞先生幫助我處理庶務，始能度過一段繁忙的日子。由於我已開始進入十八世紀中國經濟的領域，所以感到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雖然或許史語所有些同仁認為歷史研究有其一貫性，不希望近代史研究獨立於史語所之外，但我未曾以當時的行政職位來干擾近史所的發展。即使在代總幹事後期，胡院長曾問我是否有意願接任近代史所籌備處主任時，我都以自己能力有限而力勸挽留郭廷以先生。這些情況外界不了解，甚至誤認我不喜歡近史所成立，流言紛紜，為了維護胡老師的聲譽，我沈默至今。

民國五十年（1961）九月，我辭去代總幹事一職，第三度到美國，以兩年的時間先後在芝加哥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和哈佛大學訪問，看到了*The Philippine Islands*，開啓了我從中、菲、西班牙貿易來析論美洲白銀與中國絲貨貿易的研究之門。民國五十四年冬到香港後，身處國際貿易明珠的我，更深深感受到十六世紀以來東西經濟交流

在中國經濟史上的重要性。在香港三十載，我幾乎都朝著這個方向在努力，將中西貿易與明清時期的金屬貨幣制度（銀兩和銅錢兼充市場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相連結，從銀銅幣材的供給面思考，希企完成我三十歲以來的對中國貨幣史的體系化研究。

回首與史語所結緣的這一甲子，可以說是我學術生涯萌芽、成長、逐漸沈潛淡化的寫照。生於貧困家庭、長於戰亂頻仍的大環境，若非恩師、先進、同儕和晚輩的提拔、鼓勵與協助，我決不可能持續徜徉於一千多年的中國經濟史的園地中。記得剛進史語所時，只知遵照傅先生的「閉門讀書」的指示，卻因此養成習慣，找資料和寫論文成為我一生中的工作與嗜好。或許因為拙於言辭表達，除非必要，我很少開口；然而卻先後在南京中央大學、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講授了五十載的中國經濟史。這五十年來，臺灣政治環境較安定，從廢墟中一躍而為經濟大國，中央研究院的預算也漸充裕，史語所各部門的人才和設備都可媲美歐美先進國，與當初以考古和上古史著稱世界的狀況相較，已不能同日而語。而一起渡海到臺灣的不少同仁卻先後凋零。現今院內的歷史人才似乎不僅見於本所，這些年來，我忝為史語所、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諮詢委員，雖然開會時依舊寡言，但心中卻一直誠摯地希望大家能跨越「所」的藩籬，攜手共同為臺灣史學界創造出足以傲視世界史學界的成績而奮鬥。